

社科情报学理论建设的问题和思路

范 并 思

我们称系统地研究社科情报问题的活动及成果为社科情报学。目前，这还是一个尚待开拓的情报学分支领域。我们力图将这一理论的建设工作置于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的社会大变革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科学改革的总背景下，将已有的社科情报理论成果，科技情报学及国外情报学的研究成果，统统放到变化着的社会科学交流这一基本现象中讨论，以探寻建设社科情报学的理论思路。

我们熟悉许多不同意“社科情报学”这一提法人的论点。在这个“学”字泛滥的年代，这一提法的确将引起许多人的不屑。本文无意与这些人争辩，但愿他们在了解本文的基本观点之后，重新审视他们的观点。

（一）社会科学改革与需求不足的转机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科技、政治体制的改革，给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社会科学界从社会科学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中，认识到了社会科学改革的问题。目前，社会科学改革正在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由自发到自觉地展开。社会科学改革毫无疑问地影响到社会科学的情报交流机制和情报需求特征的种种方面，它客观上要求社会科学情报活动作出新的姿态，以适应日益更新的社会科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遭受“左”的毒害，加上体制上沿用的僵化模式，极缺乏为社会现实生活服务的功能。学科的理论

规范陈旧，方法单一，结构不合理。这种类型的社会科学，造就了种种与现代社会中的科学交流特征完全不同的交流现象：

“螺旋式发展”——知识增长模式，科学进步以知识增长为标志。在自然科学中，前人的研究成果总是坚实的构成后人研究的起点，重复劳动没有意义。离开继承与借鉴的科学劳动，离开了探求新的未知领域的科学劳动，都是不可设想的。因此，科学家需要有效的科学交流系统支持，以提高科学劳动的效率。科学情报工作的价值，体现在交流系统的巨大作用中。但变革前的中国社会科学，却不存在一种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增长相类似的知识增长模式。千篇一律的宣传式政策解释研究可以重复劳动，又不必以前人成果为起点；经典的研究中许多人为着微言大义而皓首穷经，而得到的成果只供后人“疑义相与析”；许多理论可以莫名其妙地被推翻，被推翻的理论也容易改头换面的再现。在这种科学劳动中，知识不能说完全没有增长，但至多也只是螺旋式增长着：极少的科学劳动成分成了后人理论工作的基石，大量的研究结果却在一个个“回到原地”的循环往复中自我消耗了。这种劳动无效益，也就无效率可言，极原始的交流系统即可保证它进行。

超“马太效应”——知识传播形态。科学学科称科学劳动中与“越是有的，越要给予；越是没有，越要剥夺”类似的现象为“马太效应”。马太效应也存在于科学交流中，人们对其褒贬不一。但一般认为，马太效应在科

学交流中弊大于利，它是对科学劳动工业化方式的一种反动。在自然科学中，马太效应只是一种辅助现象。名人的文章更引人注目，但小人物若发现了真理，一般也会关注。但在我国过去的社会科学中，马太效应恶性膨胀，一度支配了科学交流系统中知识传播的走向。名人名家的文章，尤其经典语录，哪怕牵强附会也争相引用，小人物的研究却很难出现在大人物的引文中。直到八十年代，我国社科文献引文调查的结果还是马列经典的引率最高。人一成名则成杂家，一个大人物可为许多学科的刊物写论文。这种超马太效应，强化了知识传播中的小生产方式。从引文关系看，小人物引大人物的文章，大人物引老祖宗的文章，构成一种师傅教徒弟的作坊式知识传播。即使完全没有现代科学情报服务手段作保障，这种传播也能正常进行。

“重复变真理”——理论价值标准的一种极端情况。对于仅以描写、论证、提出观点为主要方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其劳动成果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缺乏价值标准的一致性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普遍问题。在自然科学中，理论以个人的观点为起点，但是为了得到科学界的承认，必须将理论公诸于众而且必须经得起同行的检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无法用科学和实际的方法寻求一致，为了达成一致，常见的方法是利用马太效应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小团体，采取纯学术的空洞讨论和不断重复的作法来使某种学术思想为人承认。据布里顿的研究，西方社会科学中也常用重复的方法来达成一致。这是社科理论价值判断准则的悲剧。这种价值认可方式的极端情况，便是臭名昭著的“谎话重复一千遍也会变成真理”。受这种价值判断准则的制约，现代情报学思想根本行不通。

这种畸形的交流现象，构成我国社会科学交流活动中情报需求不足症。受其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社科情报所。我国的社科情

报所，体制上来源于苏联模式，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分工。从办所思想看，它吸收了科技情报理论，应该是以新型的服务方式对付现代社会中被称为情报危机的种种情报供求矛盾。它的主体功能应该是提供比传统的图书馆资料室服务高级得多的情报保障。但改革前的我国社会科学交流系统中缺乏对高级服务的需求。受这一矛盾制约，加上僵化的体制和不合理的人员知识结构，社科情报所不得不放弃科技情报所的服务模式，为“谋生”而自行调节内部功能，以至演化为今天的结构。以往的研究大量的讨论提高社科情报所服务功能的问题，却总是无力扭转社科情报所系统工作方式五花八门，服务不配套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忽视了改革前的社会科学对现代情报服务方式基本不需要这一事实。

当前进行着的社会科学改革是深刻而全面的。据1984年底召开的罗台山庄社会科学研究改革座谈会的信息表明，理论界考虑的社会科学改革是整体性的，包括科学思想、科学结构、方法论和科研管理四个层次的改革。随着改革的进行，社会科学交流活动开始出现新气象，情报需求不足症已发生根本转机。直接致使这一转机发生的特点，主要有三。

第一，以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标准的形成。社会科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将科学研究的目标转移到和我国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目标上来。社会对科学的最终要求是效益、是价值，社会科学不是封闭的、自我循环的系统，它必须为经济建设和重大社会活动的决策提供正确的思想，可行性方案和科学的理论，必须正确回答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有了这样一种观念，理论不再是不可检验的东西。全面地继承前人科学成果、准确迅速地了解科学进展，逐渐地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在这种新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由研究者独力承担全部情报

收集、检索和整理加工工作越来越难，甚至已不可能。

第二，社会科学硬化趋势。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缺乏达成一致性的力量，被人们称为“软”的科学。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学科结构的变化趋势表明，我国社会科学正在硬化。表现为：（1）一些原来较软的学科引入新的科学方法，并面向社会需要开拓了新的较硬的研究领域。（2）一批原来较硬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异军突起，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重迅速增加。社会科学硬化趋势导致社科情报需求的硬化。经济学研究中对金融、商业情报的广、快、精、准的要求，决不次于科技情报需求。

第三，自觉进入大科学体系。这里包括二层意思：（1）社会科学研究规模增大，科研中出现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工业化原则，分工协作方式形成。（2）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起，研究和平、环境、地区开发一类大课题。大科学的趋势存在已久，社会科学改革使社会科学更自觉地进入大科学体系。大科学的形成，无疑迅速地将情报需求不足改变为供给不足。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尽管我国社会科学的改革发生在“文化革命”后的特定环境中，其背景却是世界性的。社会科学面向应用是本世纪的总趋势，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趋势加剧。经历近年来新技术革命的冲击，象剑桥大学一类具有经院式研究传统的古老学府，如今也大量研究英国和世界的社会现实问题了。由此可见其必然性。

（二）机会与困难

对于上述社会科学内部的变革及其发展趋势，社科情报理论界的反应是迟钝的。大多数情报部门意识到了情报需求的涨势，希望加强自身工作以适应需求的变化。但由于意识不到需求变化的社会科学变革的背景，因而社科情报所仍在沿用情报需求不足时代

形成的工作模式，社会科学的情报保障工作仍由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方式承担。近年来社科情报理论界学术活动频繁，社科情报方面论文急增，许多研究涉及情报体制问题。但由于忽略基础理论研究，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普遍存在。例如，体制研究中“多层次、多模式、多兵种”理论似乎别开生面，但它实际只是给社科情报体制中不合理的混乱状况以合理性的理论说明。由于这一理论未深刻阐明我国社科情报系统的社会科学交流背景，因而它无法生成强化社科情报服务的实质性对策。

在武大图书情报学院一次讨论社科情报问题的会议上，有的同学提出“当前应注重理论研究，而不是急于提供情报”。这种说法初看荒唐，但它的确反映了人们对理论不足现状的忧虑。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社科情报事业，有必要从科学角度发展社科情报的理论体系，建立社科情报学。通过社科情报学的研究，社科情报理论界将对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社会科学的大变革作出积极的反应，研究当代社会中社科情报供求矛盾及解决这一矛盾的对策，以新的方法和原理丰富和完善现有情报学理论。社会科学改革环境，赋予创立社科情报学的良机。唯有当仁不让，勇于迎着失败和困难开拓这个领域，才是理论工作者应有的姿态。

社科情报学的理论创立工作，不会因为已有科技情报学的创立经验变得简单，也不会因为有待归纳的理论材料较少而变得轻松。建设社科情报学面临种种困难，尚有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当前社科情报理论面临的问题，不是无力对付这些困难，而是不知困难何在，或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社科情报理论贫乏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在苏联东欧，在英美，都可看到这种贫乏。

苏联东欧国家在体制上区分了科技和社科二种情报系统，其社科情报理论体系也是独立于科技情报理论发展的。这种背景，使

苏联东欧的社科情报理论较西方发达。其理论的系统性强,特点较鲜明。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苏联东欧国家加强社科情报的国际合作,成立了国际社科情报系统。这个系统已举行过三次学术会议,并连续制定五年活动计划。这个系统的自动化合作开展也较好,据称,在上一个五年活动计划中,自动化情报系统的理论、工艺、程序和语言保障问题都解决得较为顺利。

如此良好的情报工作基础,却产生不了优秀的情报学理论。从维诺格拉多夫近年的文章和讲话看,他们的理论并未超出《社会科学情报》的总体水平。这种理论过于强调社会科学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一面,忽略了情报学自身的规律性问题,其逻辑力量和对其它意识形态国家的情报系统的适用性极差,无法与他们国家同时期的科技情报理论相比。

英美对社科情报需求的大规模研究,始自六十年代,在七十年代初达到高峰。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对社科情报需求和服务的研究论文,还有美国心理学协会和英国巴思大学的社会科学情报需求调查和情报系统设计等著名研究。但是从1975年起,这种研究不但没有上升为更抽象的理论,反而冷了下来。这并非他们的社科情报问题已解决得差不多了。据布里顿近年的研究,现有的社科情报系统几乎完全是按科技情报系统设计的,很少考虑社科情报用户的特殊需求。

英美社科情报研究的萎缩,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他们对社科情报学基础研究的忽视。尽管英美有大量关于社科情报源、情报系统、用户方面的研究,但很少有比布里顿十年前的《情报和情报用户》更进一步的理论专著。布里顿早年研究注意了对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但未能以有力的归纳从当代社会科学的种种制约中把握社科情报交流的一般规律,指导情报系统的建设。附带说,布里顿近年来反省了七十年代初的工作,开始致力于

社会科学交流的规律性的研究,写出了《社会科学的国际性:情报传递的含义》等力作。这也许将成为英美社科情报理论跃入新阶段的标志。

东西方国家均不能因情报学理论已经确立,便可顺利地综合社科情报需求特点及社科情报系统特点,建立具有和科技情报学同样逻辑力量和社会功能的社科情报学理论,我国的情况亦如此。究其原因,早在四、五十年代科技情报学创立之前,已有贝尔纳等人对科学学问题的卓越研究。贝尔纳、普赖斯等人对科学知识生产原理和科学交流机制的深刻揭示,为情报学的创立铺平了道路。事实上,许多早年科学学理论至今仍然是情报学基础的重要理论成分。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却没有人从事过类似的工作。对社会科学的特点和社科交流机制的各种彼此矛盾着的看法并存着。人们从事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时,往往依据的是那些似是而非的对社会科学的认识。理论研究者依据的理论材料的不同,调查者选择的样本不同,都造成对社科交流特点的判断的不一致,引起社科情报理论的混乱。可以认为,对社会科学内部问题的科学学研究的薄弱,尤其是于社科知识效益和判定准则,社科知识生产方式、积累方式、传播渠道及特征等问题研究的薄弱,已成为当今世界社科情报学理论建设的最难逾越的障碍。

(三) 社科情报理论特殊性释疑

对于建立社科情报学,来自认识方面的障碍主要是人们隐含地认为情报学理论解决了情报学基础问题,社科情报理论的任务仅仅是在情报学基础上展开关于情报源、情报流程、情报服务系统和用户等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社科情报的基础理论有什么特殊性。

证明社科情报理论具有特殊性,可能并非本文可以完成。诚如我们业已指出的,

人们对社会科学交流机制尚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看法,真正澄清这些看法,需要一本类似于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巨著。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证明不了这点,那么社科情报学或者说社科情报理论领域是否就缺乏存在的理由了。社会科学是科学的一个部分,假如情报学理论对社会科学完全适用,而社科情报理论也可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的话,那么别的学科或学科群也可仿之冒出“物理科学情报学”、“生物科学情报学”,这显然荒谬。

下面例举两个社科情报理论论点进行分析,以代替更深入的理论证明来说明这种特殊性的存在。

第一例,情报分级理论。苏联情报学界有两种情报分级理论,一种是科技情报学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采用西弗洛夫按内容划分情报级别的理论,将情报分为从科学事实直到世界观一级的四个级别。另一种是社科情报理论界的分级,《社会科学情报》将情报分为三级,分别为给领导干部的情报,给科研人员的情报,给劳动群众的情报。这种分级方法的特征在于按用户价值决定情报价值,同一情报分发到不同价值级别的用户手中,即使同样被吸收,也成为不同级别的情报。导致这种截然不同的分级理论的根源,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内在差异及由此引起的交流机制的差异。两种分级理论是两种情报价值体系,一旦社科交流系统采用了不同于科技交流体系的情报价值标准,社科情报理论的绝大部分不得不重建。这是因为情报系统的设计和运行都必须受制于某一价值标准。事实上,苏联的社科情报理论也的确独立于科技情报理论。当然,社科情报分级理论所蕴含的情报价值观的正确性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例,对情报的界定。科学交流说对其所研究的情报,作了“科学情报”的界定,“科学情报——这是在认识过程中所取得的,

如实反映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现象和规律……的逻辑情报。”这一概念和科学交流说的全部论点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所以未哈依诺夫严肃地指出:“情报学所研究的是科学情报(而不是任一情报,更不是语义学的情报)的构成和共同特性”。这种观点为我国情报学界基本接受,《情报学概论》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特性,以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的科学学科”。

值得提及的是,英美情报学家一般不在基础理论中区分社科情报和科技情报,而他们的理论中也很少见到对情报的这种界定。ISO的情报学定义,几种百科全书的情报学词条,以及布鲁克斯、萨端塞维克的论著中,都是泛指的情报。

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对记述性情报或称社会动态情报的较强需求,对于那些较“硬”的学科,这一特征尤其明显。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事件、实事、数据等记述性情报,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一般也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属于“科学情报”范畴。所以社会科学情报并非科学情报的一个子集,它包含有科学情报外的成分。对于记述性情报,《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概论》有较高评价,认为它是“社会科学情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还从社会科学的特点分析了记述性情报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种分析表现出一种难得的直觉。

正确理解社科情报不限于科学情报需要深入分析科学交流机制。自然科学同样需要试验和观察数据,但这些数据经过科学家逻辑思维后,一般不再随科学情报一道加入科学交流系统。人们可以放心地使用这些科学情报,而不必担心它对数据的曲解。而在社会科学中,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利害者对同一数据的解释可以截然不同。研究者担心别人对数据的曲解,掌握数据有时比掌握理论更重要。因此记述性情报无法退出交流系统。

近年来国外“指标”类社科情报源颇受欢迎，即是证明。可见是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最终导致社科情报学与科学交流说决裂。

以上两例均指苏联情报学，至于英美情报学是否适用于社科情报理论，由于我国社科情报界缺乏对它们的系统的研究，回答这一问题尚有一定难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英美情报学体系众多，各自的理论出发点和研究侧面并不一样，对社科情报理论的适用能力也有差异。因此，社科情报界只能有选择地接受情报学的指导。为了正确地选择一种情报学理论或博采众家之长，社科情报界势必要通过对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深入研究，确立接纳理论的逻辑框架。从事这种研究，本身也说明社科情报理论具有特殊性。

（四）关于建立社科情报学

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交流给情报学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原有的情报学理论在这些问题前无能为力。社科情报学亟待建立。“目前不宜提社科情报学”的观点仅停留于表面现象。提出社科情报学，能让更多的人更加自觉而系统地从事理论的开拓性工作，这对社科情报理论的发展有利无弊。

社科情报学作为情报学的一个分支，具有和情报学基本类似的结构。社科情报学的概念框架，主要由情报学的基本概念组成：其研究方法也可沿用情报学方法；其内容也大致由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情报交流，情报用户及需求，情报系统等四大部分组成。这种类似并不意味着在基本概念的解释、方法的运用和内容的组织上照搬现有情报学理论。就理论本身而言，社科情报学力图表现自身的特殊性，并非要以这种特殊性使自己脱离情报学。相反，它将以新的理论材料修正和丰富情报学原理，说明基本源于科技情报现象的情报学中，哪些原理和方法是普遍性的，哪些原理和方法是某一类情报现象特有的。

在社科情报学的全部内容中，目前研究最薄弱，也是最具有特殊性的是基础理论部分。科学交流说的结论不适用于社科情报学，但它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科学交流说将科学情报活动作为科学交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功地研究了导致科学中产生情提供求矛盾的现代科技革命现象；分析了科学交流的种种过程，科学情报的结构及其一般性质；确定了科学文献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和科技情报活动在科学劳动中的地位。社科情报学完全可以沿着这一思路，从研究社会科学入手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尽快取得基础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后，就可在新的理论框架中对现有社科情报理论中关于社科情报源和情报流程，情报加工、处理和情报分析，情报用户和情报需求，情报体制，现代情报技术和新型服务方式等，理论材料进行理论的逻辑再组织。

为克服对社会科学研究不一致这一最大障碍，理论界应明确，社会科学交流有其自身的规律，为把握这种规律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与一般的社会科学学研究有联系又有区别。鉴于全面研究社会科学的任务过于艰巨，当前可侧重研究那些直接关系交流过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社会科学学，下面一些问题是很有必要解决的：——社会科学交流特征是静止的，还是在日益更新着？当代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无疑地将改变社科交流特征。尤其在社会科学变革时代，应注重新的理论材料，在新旧材料有矛盾时，哪怕旧材料再权威，也要小心使用。例如，社科文献专著较期刊重要是已有结论，但近来有研究表明二者的重要性在转化，这一新研究不宜轻易否定。——从科学交流的角度看，有无统一的社会科学？我们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流机制的最大分歧点，在于前者的内部差异极大，而后者基本一致。因此，应根据社科交流的特征，将社会科学划分为二、三种类型，逐类确定其交流机制。即不

图书馆学情报学新观点、

新思想、新方法

理论研讨会征文通知

为了推动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繁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发现和扶持人才,经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和华东师范大学支持、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学通讯》协助,华东师大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决定在1987年6月在上海召开以中青年为主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理论研讨会”。现向全国图书情报界公开征文。征文办法:

1. 征文对象:四十五岁以下从事图书情报教学、工作和学习的各类人员,以及其它有志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者。

2. 征文重点:

(1) 图书馆学情报学各领域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

(2) 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建设如

何为实践服务。

(3) 十年图书馆学情报学回顾与评价以及未来展望。

(4) 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战略研究。

(5) 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

3. 截稿日期:1987年4月20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4. 评选方法:来稿经统一评选后,即发赴会通知。

5. 来稿请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请注明“征文”字样。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把社会科学当成一个有共同交流特征的整体。这样做也便于我国将哲学人文科学都归入社会科学的习惯。——是研究抽象的科学交流问题,还是具体的社会科学问题?举例说,社会科学的阶级性问题一度使社科情报理论感到棘手。其实从科学交流的角度看,阶级性、政治性都不过是情报交流的个别性。即使不具备阶级性政治性的社会科学学科,也

将同文化、语言、民俗等因素形成个别性。科学交流中,它是一种与普遍性对立的现象。具有个别性的学科,情报需求呈现许多不同于科技情报需求的特征。因而社科情报学可以不考虑社会科学的阶级性问题,研究个别性即可。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使社科情报学基础形成其特有的研究。